

吕梁山上战歌嘹亮

劳有文

1937年9月,贺龙领导的八路军第120师主力挺进抗日前线,来到了地广人稀、条件恶劣的晋西北地区,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构成晋绥抗日根据地。

晋绥根据地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和前卫,也是华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与党中央联系的交通要道。在艰苦的环境下,晋绥根据地军民除了与日伪军作战,还不忘用多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鼓舞军民,介绍战争形势,宣传抗日政策。文艺是他们的枪,舞台是他们的战场,战斗的歌声飘荡在高高的吕梁山脉。

战斗剧社于1941年4月组建于吕梁兴县,是以120师独立一旅战斗剧社平剧队为基础,抽调该师所属各“战”字剧社组成。大批知识青年和专家分别从八路军学兵团、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河北抗战学院、华北联大文艺部、抗大总校和二分校等单位调进剧社,人数增加到百余人。1942年,陕北绥德和吕梁剧社合并,阵容继续得到加强。

著名作家胡正曾经回忆,吕梁剧社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抗日剧团,一个是阎锡山“牺牲救国同盟会”下属的剧团,因此又得到了当局的演出许可。抗战开始之后,晋西南每个县都有剧团,部队每个团几乎也都有剧团。这些剧团在宣传抗日救亡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剧社就是宣传队,出门一边行军一边写标语,到了村子里就唱歌,晚上就是演戏、跳舞,吸引群众,宣传抗日。标语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样浅显易懂的内容,营造了很好的抗日气氛。当时的标语有黑白两种颜色,白色是刷石灰,走到哪里刷到哪里;黑色是刷煤灰,到老百姓家烟囱里刮煤灰,和上胶写。标语一般用正楷字,如果有时,还会写美术字美化一下。

战斗剧社一边收集地方演唱材料、地方小调,一边改编旧剧(梆子、道情、秧歌)与编演高跷、跑旱船、跑车子、独龙杠、钻眼等杂技节目,进行抗日宣传。剧社成员的生活就是跋山涉水,编戏排戏,他们见缝插针,在乡村、前线通过政治讲话、宣传报道、文艺演出、心理疏导等,揭露日军罪行、动员群众参军、安抚受伤士兵、救援老百姓。

只要有剧社演出的消息,乡亲们就奔走相告,十里八村的人都赶来观看。每次演出,台下总是人山人海。乡亲们来的时候,有的坐马车,有的骑毛驴,有的步行,阵式特别壮观。乡亲们兴奋地说:“好家伙!八路军带着大部队,到处搭台演戏,宣传打鬼子……”

剧社演出的歌词和话剧题材,都是取材于日常的战斗故事,没有华丽的舞台,乐器简单,甚至只用两块竹板打个节拍,即使很简单,也深受战士们和老乡们的欢迎。

剧社还有一个任务是教育俘虏。一场战斗下来,总能抓到一些伪军,有时也有日本兵。他们给伪军讲中国人不能把鬼子打中国人道理,很多伪军接受改造加入了八路军。有的日军俘虏受教育后投诚,剧社成员们就跟着日本兵学日语,再用日语向敌营鬼子喊话,有些俘虏甚至会参与到文艺演出中。

战斗剧社在抗战时期编演了大量的文艺宣传节目,先后在晋西北、冀中、晋察冀、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编演了《丰收》《水灾》《黄河三部曲》等一批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

曾创作出《党的女儿》《上甘岭》等影片的林杉,是吕梁剧社、大众剧社等抗日文化团体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后来根据晋绥根据地的生活,拍出了电影《吕梁英雄》。

红色记忆

太原筵席八大碗

李拉弟

每逢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老百姓都讲究吃“席”,不同场合中有一种大家都吃过却又各不相同的席面——八大碗。有别于其他传统筵席,八大碗没有固定的配方和操作程式,都是厨师根据各地特产、现有条件烹饪而成,内容、花式和装饰并不统一,各有千秋。

说白了,“八大碗”就是用八碗菜来招待客人,俗称家筵、也称事宴。

八大碗,古代筵席之一,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其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流传甚广。筵席始于上古人类敬天祭祖的祭祀活动,是上古人类跨入文明门槛后的产物。《礼记·乐记》:“铺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不难看出,筵席、盛器、食物、礼仪已融合在一起了。

“筵席”一词产生之前,就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如《竹书纪年》:“帝继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钩台。”《礼记·王制》:

定规碑铭记民生为要

胡小芳

在风峪沟北岸太山龙泉寺的碑廊中,定规碑无声矗立,墨黑色石壁上镌刻着灰白色碑文,笔力苍劲,依稀可见岁月侵蚀的痕迹。细读这些略显晦涩的文字,可穿越岁月,隐约窥见太原县城的峥嵘往昔。

清乾隆年间,西山九峪归太原县管辖,繁杂的劳役使得风峪沟百姓有苦难言。当时,风峪沟内各项事务由其经过的店头、程家峪、黄治、要子庄、魏家店、王家庄、田家庄、周家庄八个村庄轮流当值。清乾隆五十年(1785)春,风峪八村值首轮到店头村的李廷科,他心系风峪八村民生,面对太原县衙派下的劳役事务,不禁感慨:“天下都讲究公平,但公家所派劳役却有参差。”他想要改变现状,于是与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郭氏族长郭凌汉商议后,由族人郭振奋主理、郭凌汉启笔文书,上报太原县衙。

郭凌汉先生条理清晰道明上报的原因:风峪沟山野偏僻,民众稀少,差使杂乱繁重。随后详细列举了他们认为应当承担的和不应再承担的劳役差事。

文书写好后转发各村商议,七个村中,除程家峪村因惧怕官府没有同意外,其他村庄都爽快同意。

乾隆五十年三月十八日,时任太原县令的杨县令收到文书后,立即着手解决此事。他向下属各个官署发文通知,并回复风峪八村:上报之事已知道,并已通知下级各官署。不久,各官署与风峪八村订立合同凭证,共同约定:风峪各村以后承担太原县衙下派差事中,只需办理科举考场所用的煤炭、荆树枝条,春秋丁祭时所用的柴窑散片,其余差事无需再摊派力役。

事情解决之后,太原县衙又针对下级各官署与风峪八村订立合同凭证一事再发文书,杜绝官府随意加派差事的情况。风峪沟百姓闻之欢喜,心怀感念。

从定规碑全文600余字的叙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太原县衙的办事方式、文书格式、差役安排,还可以了解风峪沟的风土民情和主要物产。碑中所载内容,只是村民为减差役之苦、合力上报官府减免的小事,看似未生太大

波折,却关乎风峪沟每位百姓的生活,考验着“为民抱薪者”的坚定,也考验着为政者关心民生的态度。在碑文末,定规碑的叙述者郭凌汉先生感叹:“事耶运耶定规耶?安得不刑石永垂耶!”这也是为何程家峪村担忧事情失败而没有同意的重要原因。

时光倒回到清乾隆初年,程家峪当时名为成家谷,以成、史两家人为众。这一年,风峪八村差役值首轮到成姓家族中人担任,史姓家族在背后支持。当时,风峪八村徭役、摊派名目众多,百姓生活不堪言。成姓值首体贴百姓困苦,在与其他七村商议后,多次向县衙提出免除不应负担的税赋、杂役的报告。县令不但不予理睬,反而上报太原知府,要以违抗上命论处。得到信息的成、史两家唯恐祸及族人,于是扶老携幼,告别生活了1000余年的成家谷村,另谋生路。成、史两家迁徙他处后,村中程姓人成为大姓,因此把原村名成家谷改称为程家峪。

50年后,同样的境遇、同样的诉求,程家峪村民却不敢重蹈覆辙。文书所求事宜顺利达成后,程家峪的百姓也支持庆贺,于是,清道光六年(1826),店头村紫竹林内又重新树立了一通定规碑,碑文与龙泉寺定规碑记载的内容、年代、立碑人名录等都一样,唯删去了龙泉寺定规碑中“独程家峪固负不服”的文字。

为政之道,民生为要,中国民生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左传·宣公》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涵盖了古人最朴素的民生思想,其中“民贵君轻”“平政爱民”“富民强国”“重民保民”“恤民忧民”等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定规碑中所记载的文字,不仅记录了一段勤政为民的故事,同时也反映了古往今来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定规碑,是以人民群众心声为执政者“定规”,也是执政者恪守承诺为自己“定规”,其为民思想在岁月磨砺下历久弥新,在今天依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龙泉寺定规碑 太山博物馆供图

名都自古并州



(27)

以诗参政的小说家

孙琨

郭澄之,山西历史上最早的小说家。翻阅2003年出版的《太原史稿》,有这么一段文字:“太原阳曲人郭澄之,系东晋人。《晋书·文苑传》称其‘少有文思,机敏兼人’,官至刘裕相国从事中郎。《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十卷(已佚)。又有笔记小说《郭子》三卷,记述魏晋名士的佚闻故事,文笔简洁、生动。此书唐代犹存,贾全曾为之作注,唐以后佚。《郭子》同东晋闻喜裴启《裴子语林》同为刘义庆《世说新语》取材。鲁迅先生《古小说钩沉》中辑有其八十余则佚文,可知该书在我国古代小说中的地位和影响。”

这么一位文采出众的小说家,在历史上浓墨重彩记录的不是他的文学成就,而是他的一段参政经历。

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军队攻陷晋都洛阳。西晋皇族司马睿南迁,北方士民为躲避战乱,纷纷渡江南下,史称“永嘉南渡”。这次南渡的世家大族中,就有郭澄之所在的名门士族,太原郭氏。

郭澄之,少时即有才思,机敏过人。以孝廉步入仕途,始为尚书郎,没有多久,就在尚书郎职位上出任南康相,成为南康郡(今江西省)最高行政长官,管理赣县、雩都、平固、南康、揭阳五个县的行政事务。

东晋末年,爆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反晋斗争,波及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郭澄之在这场战乱中,流离奔波,辗转回到都城建康。战争平息后,掌控朝政的刘裕任命郭澄之为相国参军,进入刘裕的幕府,开始参谋、建议刘裕的政治军事决策。

公元416年,北方的后秦政权发生内乱。刘裕认为这是灭亡后秦的良机,遂率大军北伐,郭澄之随从刘裕参赞幕府。一个月后,刘裕攻下彭城(今徐州),占领洛阳,剑指后秦都城长安。下一步如果能攻占长安,北方统一指日可待。然而,下属及众多幕僚表示反对,刘裕于是征询郭澄之的看法。

郭澄之深知,后秦军力并没有遭到重创,难以速战速决;同时,攻下长安能否守住也是问题。然而,自己不是刘裕起家时的班子成员,身份无法与刘裕的老部下、老参谋相比。面对刘裕的征询,他避免正面回答,而是脸朝西,背诵了曹魏时期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诗句:“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小说家的才华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在这里完美结合:意见表达了,但需要决策者刘裕自己思考。

《魏书》记载,刘裕“家本寒微……仅识文字”,但他不愧是政治家、军事家,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郭澄之的意思他听懂了,应当撤离长安,班师南归。于是,刘裕决定率师还朝。

历史的走向给郭澄之的判断作了一个完美的注解。刘裕在第二年再次北伐,击退北魏的攻击阻挠后,用了8个月,四路大军分兵进击才攻下长安。刘裕退兵以后,长安得而复失。结果符合当初郭澄之的判断。

郭澄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的小说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却很少提及,而是作为刘裕幕府成员,凭借“以诗参政”载入了历史。在地方志《乾隆·太原府志》人物卷中,没有收录郭澄之的生平,而是放在了“文苑”部分,其文学成就的表述,仅仅有七个字“所著文集行世”,这应该是与当时传统文化对刚刚问世的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持轻视的态度有关。

晋人物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

随着阶级的产生,饮食逐渐变为部落首领和统治阶级彰显自己身份、教化民众服从等级分封的有力宣传手段。从九鼎八簋到三鼎二簋,再到《礼记·王制》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无不反映等级制度的严格。

翻看史料发现,最早的宴饮活动,是坐在地上进行,“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也就是许多学者所说的“分餐制”。分餐制至少存在了3000多年,随着高桌、大椅的出现,合餐制应运而生,并在北宋时期正式取代分餐制,逐渐演变为现在常见的围桌而食。似乎有点巧合,大桌、高椅就和道教里的八仙一样,起源于唐,发展于宋、元,盛行于明、清。八大碗应该就是这样和八仙挂上钩的。

明清时,盛行“八仙桌”“大圆桌”,宴会形式已经改变,宴席却仍沿称为“筵席”,座位仍沿称“席位”,筵席与酒席成为同义词。

太原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历史上许多王朝都与这座城市有过密切的关系。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所撰的《通典》记载:“初,武太后长寿元年,以并州之故里,改为北都。”李白《秋日于太原南栅饯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天王三京,北都居一。”王建《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唐天宝元年(742),唐玄宗还将北都升级为北京,足见当时三京商业相当繁华,餐饮饭菜可见一斑。

太原菜在传承唐朝时期主流烹调方法蒸、煮、烙、烤、煎之外,还有燠、煨、扒、焖、酱、烧、炖、燂等多种烹饪方式。用各种肉类、蔬菜制作的羹羹,就采用了很多方法烹制;就连史书记载不多的菹菹(切得很碎的腌菜),也用于饭菜烹饪中。

在太原,一说起筵席,就少不了八大碗,尤其是在农村,除了笼上蒸的三四样,就是牛槽火上用粗土砂锅煨的几个菜,那种氛围,氤氲着各种炊具散发的香气……

还有老太原人津津乐道的老太原三大饭店:林香斋饭店、晋阳饭店、上海饭店(鸿运楼)制作的八大碗,他们与乡村八大碗相差无几,让人久久回味。

但凡是触动心弦的美食,都有其独特的灵魂。太原饭菜,未必多珠翠之珍,但自有味道。像充满敬畏心、招待上司和敬奉长者寿宴的九个碗儿,彰显知礼仪、明事理、守规矩的八大碗,以及多种富有区域民风、乡俗礼仪的饭菜:色泽红润、肥而不腻的烧肉方;咸香爽口、味道浓郁的烧肉条;美味鲜香、香气四溢的小酥肉;外表圆润、酥而不烂的清蒸丸子;软嫩鲜香、卤味十足的豆腐蒸碗;色泽鲜艳、质软香甜的八宝饭;味道醇厚、营养丰富的海带肉;清淡爽口、老少皆宜的虾米白(馒头)……

这种接地气的饮食筵席,已不是一桌饭菜,而是一种乡愁和文化。

晋之味